

四处融资债台高筑 土地收入难抵本息

地方政府为还欠账“愿卖爷田”

本报记者 罗兰

国家审计署最近的审计结果显示，我国部分地区债务规模有扩大趋势，债务风险凸显。为进一步了解情况，审计署将下大力气进一步摸底。7月28日，审计署发布消息称，根据国务院要求，审计署将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对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专家表示，对地方债务总量扩张可能引发的危机要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实体经济，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尽快叫停卖地还账的做法，切实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部分地区债务风险凸显

近两年来，一些地方债务逐步攀升。根据审计署公布的36个地方政府2011年以来政府性债务的审计情况，截至2012年底，上述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3.85万亿元，两年以来增长了12.94%。

“我们必须看到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隐患。”中国审计署外交外事审计局局长马晓芳说，两年来，有4个省和8个省会城市本级增长率超过20%，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已超过100%，最高达189%。

这些背负巨额债务的地方政府，在融资和偿还能力上都存在诸多问题。审计署有关负责人指出，一些地方通过信托、BT（建设-移交）和违规集资等方式变相融资问题突出，隐蔽性强、筹资成本高，蕴含新的风险隐患；融资平台公司退出管理不到位，部分融资平台公司资产质量较差、偿债能力不强；一些地方还存在违规担保、违规融资、改变债务资金用途、债务资金闲置等问题。

从偿债能力看，有些地区过度依赖土地收入，4个省和17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有55%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但这些地方2012年需还本付息额已达其可支配土地收入的1.25

倍；高速公路、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债务规模增长快、偿债压力大、借新债还旧债比例高。

快出政绩短线思维作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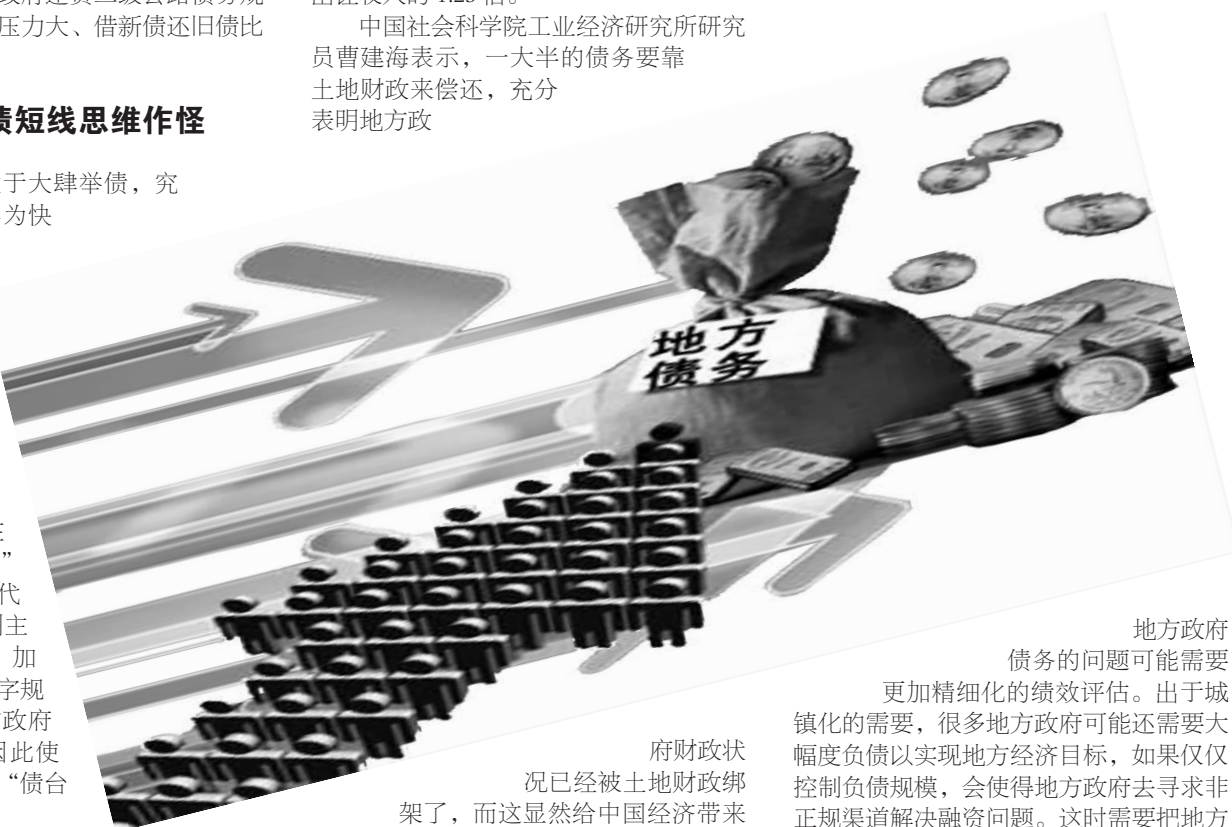
部分地区敢于大肆举债，究其原因还是领导为快出政绩，只顾眼前不考虑长远发展的思路在作怪。

“由于地方债务多用来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它的偿还能力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指出，加上“举债”的数字规模远远大于地方政府的偿还能力，因此使得地方政府最后“债台高筑”。

借债不怕，关键是否能偿还。事实上，很多地方过度依赖土地收入偿债的做法越来越难以以为继。国家审计署公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18个省会和直辖市，有17个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来偿债，比例高达95%。

随着土地出让收入增幅的下降，部分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偿债需求。《审计结果》显示，由于2012年土地出让收入增幅下降，地方偿债压力加大；2012年底，4个省级、17个省会城市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需偿还本息2315.73亿元，为当年可支配土地

出让收入的1.25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海表示，一大半的债务要靠土地财政来偿还，充分表明地方政



府财政状况已经被土地财政绑架了，而这显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影响。最典型的就是当前房价泡沫越吹越大。

绩效评估仍需要精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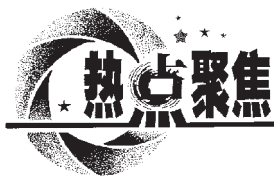
对于地方债务总量不断扩张有可能引发的危机，审计署表示，要高度重视，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进一步清理规范融资平台公司，抓紧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实现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全口径管理和动态监督，切实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吴卫星认为，解决

地方政府

债务的问题可能需要更加精细化的绩效评估。出于城镇化的需要，很多地方可能还需要大幅度负债以实现地方经济目标，如果仅仅控制负债规模，使得地方政府去寻求非正规渠道解决融资问题。这时需要把地方的经济目标分解，要明确哪些目标是合理的目标，哪些任务是地方政府必须完成的，哪些是可以交给市场解决的。

“地方政府必须对其依靠负债获得资金的使用效率负责。政绩的考核也不应该只关注其地方经济的短期效果，而应该对更为长期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吴卫星建议。



退休老人游喀纳斯



7月26日，来自新疆喀什地区的146名离退休老人乘坐旅游专列来到被誉为“人间净土”的新疆喀纳斯景区游玩。据介绍，这些老人退休前全部工作在基层一线，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乘坐火车来到北疆。

图为来自喀什地区的老人乘坐游艇欣赏喀纳斯湖美景。新华社记者 赵戈摄

“江南吐鲁番”喜丰收



浙江省长兴县葡萄种植总面积已达3.72万亩，预计2013年总产量将达4.3万吨，实现产值2.7亿元以上，成为提高当地百姓收入的重要产业，也带动了当地的乡村旅游，长兴县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江南吐鲁番”。

图为一名小女孩在家人的帮助下采摘葡萄。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兰新铁路 客运专线 加紧建设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客运专线——兰新铁路客运专线（甘青段），日前已进入了电气化施工阶段。中铁电气化局三公司的工人们，从2013年4月开始，克服了高原反应、交通不便、生活条件差等困难，日夜奋战在平均海拔超过3100米的施工路段上。图为7月28日，在青海省门源县境内的施工现场，工人们将接触网支柱安装就位。新华社记者 王頌摄

城市间暗中较劲 高楼数直逼美国

摩天大楼不能任由疯狂生长

■已有470座 ■在建332座 ■规划516座

本报记者 周小苑

市场观察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建和计划建设的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不断刷新着“最新”和“最高”的纪录，引发了社会公众的热议。尤其是近日在湖南长沙开工建设“天空之城”再次成为舆论焦点，这个号称高达838米、比目前世界第一高楼迪拜的哈利法塔还要高10米的摩天大楼，受到广泛质疑。中国真的需要这么多摩天大楼吗？过度追求高楼大厦表面的光鲜亮丽真的是城市发展的必需吗？

2022年将达1318座

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比肩林立的写字楼和商业中心逐渐成为中国各大城市兴盛繁荣的标志，尤其是超过152米高的摩天大楼数量更是不断创出新高。根据《2012摩天城市报告》显示，中国大陆拥有非住宅类摩天大楼总数470座，在建为332座，规划为516座；而美国现有同类摩天大楼为533座，在建6座，规划24座。预计至2022年，中国摩天大楼总数将达1318座，是美国536座的2.3倍。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全国各地建设大楼不断“求新”、“求高”，似乎成了各城市之间无形的竞赛。去年，正在兴建的中国第二高楼湖北武汉绿地中心尽管已高达606米，但仍计划更改规划进行拔高，冲击中国第一高楼；紧接着，高达660米的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已经开工；随后，已经列入规划的山东青岛777大厦则高达700米，如果建成将再次刷新中国第一高楼的纪录。

但是，这些摩天大楼都可能还不是中国最高的，直到近日，欲与世界第一高楼试比高的长沙“天空之城”终于浮出了水面。

质量和安全存隐忧

事实上，自从“天空之城”这个号称要在7个月内建成世界第一高楼的项目开工之时，社会公众对其质疑之声就不绝于耳。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仲继寿表示，虽然并不是一定要反对建设这些高楼，但是究竟应该怎么建设，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性能，是不能以单一高度作为标准的。

此外，“天空之城”惊人的建设速度更是存在质量和安全的隐忧。在宝佳集团总建筑师鲁萌看来，摩天大楼这么快的建设速度有点不靠谱。他表示，强调速度的同时，意味着牺牲质量，因为施工过程中水泥强度、混凝土、柱都需要一个过程，钢结构也需要一个应力的适应过程。大楼也是有沉降过程的，比如说一座楼10层的时候是一个重量，100层、200层又是不同的重量，会造成下面地基基础的变形，只有稳定了才能再往上盖，这些都需

要时间周期。

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也认为，“天空之城”所宣称的这套建造技术在国际上没有先例，具有极大的实验性质，建成以后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测。此外，该项目承诺造价相对又是非常低的，因而只有两种可能，要不就是在建造技术上有惊世之举，要不就不是一个骗局。

别拿高楼当城市名片

“各个城市在争相建设更高的大楼，是为建设城市名片，提升城市形象。”在仲继寿看来，建设高楼大厦最初本身是为了节约土地，为了在城市中心享用更好的交通、医疗、就学等公共设施，适当提高容积率，让更多人享用公共设施。但是现在却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

在为城市争得光环的同时，这些摩天大楼也为城市发展埋下隐忧。就自身而言，在消防、抗震等方面它们表现得更为脆弱；对城市而言，它们对地下设施、交通的潜在影响难以估测。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宋颂兴表示，虽然建高楼的时候，可能会为地方的GDP带来较快的发展，但是过度建设却推高了房地产泡沫。从市场的经济角度来看，往往大楼越高，成本越高，后期维护等问题会不断涌现。地方政府在推动高楼建设的时候容易，但是如何跟城市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就很难了，所以不能面对高楼头脑发热，不理智地建设过多的高楼。

那么，未来中国摩天大楼的建设应该遵循什么标准呢？仲继寿认为，在国内争建高楼大厦的同时，不能只考虑单一“高度”的指标，而是要考虑设备系统的安全性，尤其是要考虑节能环保因素。



商海春作（新华社发）



声音

取消利率上限有利农村

取消农信社的利率上限，短期内可能带来市场波动。但长期来看，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下，“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在农村市场“此起彼伏”的博弈中，信用社贷款利率上升、高利贷贷款利率下降，利率会逐渐趋于均衡，并最终下降。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李国祥表示。

加快推进消费信贷发展

中国要想更好支持制造业发展，释放消费潜力，应加快推进面向消费者的金融贷款服务。这一创新服务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建议。

企业发展要靠内生动力

一些企业往往期待刺激性政策带来市场，但对政策的依赖决定了这种增长只能是阶段性的，随着政策效果的稀释，利润增幅必然出现下滑，企业缺乏发展的长远内生动力。这些企业需要主动调整经营思路、加快技术研发，靠内生动力走出发展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说。

极限增长将付出大代价

7.5%的经济增速放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一个很漂亮的经济数据。中国如果继续走原来的高速发展道路，那将是一种极限增长，付出的代价必然比较大。所以，要想走得远，现在就要慢下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表示。

（柴秋实 王恺辑）